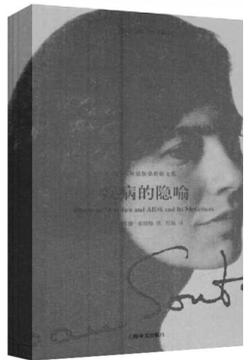


走出疾病的道德阴影

牛寒婷

提示 无论结核病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如何成为优雅、敏感的象征,无论癌症在20世纪早期如何被与受压抑的激情联系在一起,也无论艾滋病意象多么具有道德上的惩罚意味……这些对疾病的联想几乎都认定了一个这样的事实:病人对患病负有责任。这种归咎,无论来自医学判断还是世俗偏见,或多或少带有贬损和轻蔑之意,更有甚者,还直接为病人贴上了“生活失败者”的标签。通过梳理疾病的隐喻史,苏珊·桑塔格《疾病的隐喻》想要做的,就是帮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病人,去尽力摆脱隐喻的指控。



突如其来悠长假期,让有关灾难和人生的困惑与思考,成了精神生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那些如奥德修斯一般智勇双全的探问者,首先开始了知识上和思想上的突围与呐喊。于是,与之呼应的现象之一,是《鼠疫》《十日谈》《疾病的隐喻》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等有关疾病和瘟疫的书籍开始走俏,而我也网购了一套《加缪全集》。货到以后,翻开《鼠疫》,我的目光停留在了小说结尾的几行字上:“据医书所载,鼠疫杆菌永远不会灭绝,也不会消失,它们能在家具、衣被中存活几十年;在房间、地窖、旅行箱、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。也许有一天,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,让它们藏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,使人们再罹祸患,重新吸取教训。”加缪意味深长的话语,像在密闭空间里不断滋生的幽闭恐惧,无论科技如何昌明发达,鼠疫或是所有瘟疫,都会像暗夜一样必然降临——等等,瘟疫、疾病,我是在拿黑夜作比喻吗?而倘若疾病真的被我用作隐喻,是否会如苏珊·桑塔格认为的那般就不正当了呢?放下加缪,翻开《疾病的隐喻》,重温桑塔格以作家和癌症患者的双重身份所作的“自述”,显得很是必要。

“我是病人,不是病毒”

即便没有发生疫情,对于讳疾忌医、歧视病人这类事,人们也不会感到陌生。很多人无法理性地面对现实,连医生,在人们罹患某些疾病时,也倾向于不向病人告知实情,这几乎成了行业惯例。而对于顽症、绝症、传染病等特殊疾病,人们更是根深蒂固地持有偏见,将之视为洪水猛兽,下

意识地歧视病患。所有这些不科学、非理性的心理、俗见和陋习,不仅影响病人的治疗,更把疾病本身神秘化了,正是在这些不健康的疾病话语洪流中,《疾病的隐喻》出版了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,40多岁的桑塔格患了乳腺癌,并进行手术。在治疗过程中,她深刻地体验到了癌症患者所蒙受的污名,亲眼看到了癌症的名声之恶是怎样地加剧了病人的痛苦。对此,她感到非常愤怒。她迅速地从医生不乐观的诊断所带来的恐惧和绝望中摆脱出来,拿起笔,开始为癌症和疾病王国除魅祛魔。1978年1月开始,《作为隐喻的疾病》连载于《纽约书评》,同年该书出版。而在接受了两年半的治疗后,桑塔格也终于痊愈。

癌症治愈个案无疑具有极强的励志作用,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桑塔格的思想。在这本书里,她考察了结核病、癌症、麻风病、梅毒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疾病,是如何在人类历史中被一步步隐喻化的。无论结核病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如何成为有趣、优雅、敏感的象征,无论癌症在20世纪早期如何被与受压抑的激情联系在一起,也无论艾滋病意象多么具有道德上的惩罚意味……这些对疾病的联想几乎都认定了一个这样的事实:病人对患病负有责任。这种归咎,无论来自医学判断还是世俗偏见,或多或少带有贬损和轻蔑之意,更有甚者,还直接为病人贴上了“生活失败者”的标签。通过梳理疾病的隐喻史,桑塔格想要做的,就是帮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病人,去尽力摆脱隐喻的指控。

病人无辜,患者无罪,歧视病人有违人道,在现代医学面前,这

些原本都是简单的道理。很多时候,人们之所以仍会不自觉地对疾病和病人抱有偏见,是因为,潜在的求生本能和人性的自私在作祟,这也同步暗示了人们对待疾病的阴郁态度和惧怕死亡的脆弱心理——疾病与死亡,被视为生命的对立面。然而,否定与回避现实从来都无助于解决问题,即便是最健康的人,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“病人”。所以,善待病人,破除对疾病的偏见就变得尤为紧要,比如与“武汉肺炎”相比,“新冠肺炎”的叫法,就会更少一些歧视色彩。

隐喻的正当性

《作为隐喻的疾病》出版12年后,鉴于艾滋病的盛行,桑塔格又写了《艾滋病及其隐喻》一文,1990年,两个“隐喻”合集出版。与12年前的凌厉峻急乃至气急败坏不同,此番写作,桑塔格起笔伊始就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对“隐喻”的定义:“以他物之名名此物”,并坦承隐喻是“与哲学和诗歌一样古老的智力活动”,是包括科学认知在内的大多数认知和表达滋生的土壤,“没有隐喻,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。”细心的读者会发现,虽然这两篇论文在主题和论述上一脉相承,但在观点上还是文风上,12年后的桑塔格都冷静并温和了许多。她甚为理智地,用了近乎一整节(占全文1/8)的篇幅,为自己多年前的隐喻批判进行了辩护。

显然,重温早年的论述,让桑塔格意识到了某种界限。在疾病的隐喻“王国”里——借用她使用的“疾病王国”的隐喻——并非所有的隐喻都是不正当的,尤其是那些文学作品中的隐喻。隐喻是

语言和心灵世界的摆渡船,若没有它,思考和想象都无法顺利进行,如同桑塔格下意识地就把疾病比喻成了王国,一不小心令她也成了自己批判的对象。

如果说,文学中疾病的隐喻真的到了一种应该被严厉指责和大加挞伐的地步,那么文学创作还能容得下什么隐喻呢?而没有了各色隐喻,文学又将如何存在?不言而喻,批判疾病的隐喻与桑塔格另一个著名批判“反对阐释”一样——应当有特定的目标和精准的靶心,决不可以将批判的边界无限延展。换句话说,只要不涉及对疾病和病人的偏见歧视,只要不引发对现代医学的非理性认知和种种误解,疾病的隐喻完全无可厚非。其实,即便是桑塔格最反对的对于疾病的军事隐喻,也自有它的用武之处:现在的癌症、艾滋病,以及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种疑难杂症,人类至今无法攻克,对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威胁,难道不正像是一场又一场“进攻”和“侵略”吗?但是,正是在应对“战争”袭击的过程中,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艰难地取得一点一滴的突破和进展,因而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。

无论有怎样的瑕疵,桑塔格思想的价值都不应被低估。作为癌症患者,她以思想为武器与顽疾抗争,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钦佩。而她所发出的质询诘问,对所有病人而言,都不亚于身体治疗之外的精神疗法。在终极意义上,她呼吁人们正视疾病与病人,乃是在呼吁人与生命的和解——既然死亡无法逃离,既然向死而生的人生无法甩掉疾病,那么,像迎接晨曦与落日那样接受它们,难道不是一种合适的选择吗?

书单



《书房一世界》(作家)

本书为冯骥才2020年开年推出的全新随笔集,辑录70余篇精妙短文,皆以作者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起兴,娓娓道来,串联起作者人生的细节,引申出不能忘却的纪念,或是人生中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,意境深邃而辽阔。正如作者所说:“对于作家,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。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,是自己精神的原点,有自己的定力。”书房,作为一个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,处处折射出作者隐秘的精神世界。



《云游》(四川人民)

托卡尔丘克认为现代作家尚未寻找到描述当下世界的合适方式,而碎片化的写作或许是她个人在文学表达形式上的尝试。帮助她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都用断章式的结构完成。而她的布克奖作品《云游》在这方面则走得更远,这本书完全没有统一的故事性,故事随着主人公旅行的思路展开,没有历史与空间的限制,用或长或短的节奏表达着作者对世界的理解,有些故事具有幻想性,有些则像是发发现实的感触。这种飘离的精神状态使得《云游》成了一本诗集般的小说,你可以打乱顺序翻开任何一页开始阅读,同时,每一段故事都有着成为自我入口的可能性。尽管这种写作方式未必能完成描述当下世界的宏伟目标,但它绝对完成了托卡尔丘克在写作上的另一种追求,为已经改变了阅读习惯的当代读者提供新的文本建构方式。

草花一束

毕亮

《草花集》是汪曾祺的众多散文随笔集中的一本,只有薄薄的100多个页码,作为成都出版社听雨楼文丛之一,出版于1993年。我在26年后,偶遇于伊犁。

《草花集》不是什么难得的书,但胜在作者生前自己选编的,而且还专门写了序,和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汪先生著作,虽然内容没有什么不同,但看时的感觉大异。

我买书向来是随遇而买,虽爱读汪曾祺,却也没想着专门去搜他生前出过的书。我身边就有朋友,爱读汪曾祺爱到把汪先生生前出过的书一本本地收齐了,甚至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《邂逅集》都让他千方百计买到

了。寒舍所存的汪曾祺著作,也仅有两种《汪曾祺全集》以及之前零零散散的十几种单行本。后来尤其近几年出版的汪曾祺单行本作品集都敬而远之了。话虽如此,但有时偶遇年代早一点儿的,尤其是汪先生生前自己编的集子,总是忍不住要买。《草花集》即为其一,看目录,书中文章也都看过,许多篇目甚至看过不止一遍,但看看书品,再翻翻装帧,还是顺手就买了。

过了几日,要去驻村,临走时从书架上抽出《草花集》放到了随行的包里。住户时,随手抽出来读几页,也很快就看完了。《洁源》是汪曾祺写“下放”生活的篇章之

一,文章写得自然是好。他自认为“下放”是“三生有幸”,所以去洁源,也并不觉得是苦,在他笔下,甚至觉得是一种幸福,是“逍遥自在之极”,每天早上摘两丛还带着露水的马铃薯花和叶,上午画花,下午画叶;马铃薯成熟时就画马铃薯,画完的薯块在牛粪中烤熟吃着,于是也有了自夸的资本:“我敢说,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,全国盖无第二人”。

其实,这些都是去了洁源以后的事,仅看汪曾祺去洁源的马铃薯研究站路上的心情就知道,他是愉悦的,并不是常见的那种遭遇“发配”的郁闷。汪曾祺去研究站,坐的是牛车,牛车走得

很慢,他“就躺着看看蓝天,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——这真是‘大地’,大得无边无沿”。你看,这哪里是“发往军台效力”,简直就是旅游,是度假。

看版权页,《草花集》首印是三万册,这在散文集里,不是小数。要知道,《草花集》出版的前几年,汪曾祺在漓江出版社出版《汪曾祺自选集》,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《晚翠文谈》,首印也都只有两三千册,加印那是后来的事。时隔几年,也可以看出汪曾祺的读者群在不断扩大,也很有市场。这个“市场”在汪曾祺去世后,更是不断地在扩大,他的作品也正影响着后来的作家。最近,《中华文学选刊》

对100多名3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作问卷调查,其中一个问题是“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?请列举三位,具体说明原因”,看了他们的回答,“汪曾祺”出现的频率颇高。

像《草花集》这样的“小书”,很适合带着路上读,文字很美,看着是一种享受,可消解奔波之疲劳。正如他在《自序》里写的那样,“辛苦了一天,找个阴凉的地方,端一个马扎或是折脚的藤椅,沏一壶茶,坐一坐,看看这些草花,闻闻带有青草气的草花淡淡的香味,也是一种乐趣”。汪曾祺把他的这些文章比作是草花,所以读汪曾祺,如看草花,也是一种乐趣。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中国少年 仁心大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上海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